



- ◆ 人工智能在走向人人可用的同时,也放大了趋同的风险。
- ◆ 要让数智赋能不走向模板化,功夫还得下在地方文脉上。

数智赋能不等于也不应等于“模块化”

陈钢华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文旅领域,这一进程正在提速。从几分钟即可生成的宣传文案和海报,到成为城市营销新宠的AI(人工智能)短剧,再到借助AI创作的沉浸式演艺和场馆互动脚本,过去费时费力的创作,如今变得又快又省。尤其对人手紧张、预算有限的基层文旅单位而言,数智工具的提效减负作用实实在在。

热闹中,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翻看各地的文旅推送,“千年古韵”“诗意栖居”等句式反复出现,青石板、红灯笼的画面频频;不少剧本游和演艺作品情节大同小异,换个地名几乎通用。如此一来,效率是上去了,辨识度却掉下来了。

这一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早些年,技术主要服务于信息查询、在线预订、客流管理。在这些环节,标准化是优点。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进入内容创作环节,触及的是文化本身。通用大模型按概率生成内容,天然地“偏爱”最常见的表达。一句方言、一段典故、一门手艺的独门工序等一方水土最独特的内容是语料中的少数。当模型对一个地方知之不深时,便只能以通用审美和现成套话来填补。由此,人工智能在走向人人可用的同时,也放大了趋同的风险。

古人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文旅的重要魅力正在于这份不同。人们常说的“烟火气”,本质上是一个地方的氛围,是贴近生活的真实

体验。它藏在清晨早市的吆喝里,藏在街巷深处的乡音里,也藏在一道家常菜独有的火候里。游客之所以远道而来,找寻的正是这份“只有这里才有”的体验。倘若科技赋能只是抹平了地方之间的差异,那我们又要它做什么?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实践已经给出了更好的答案。在福建泉州,AI剧本游以故事线串联起开元寺、西街、非遗工坊、街边美食店,游客循着剧情穿街走巷,不知不觉间便读懂了这座宋元海港。在湖北武汉,《AI上黄鹤楼》让李白、崔颢隔空对诗,观众还能随剧情闻到热干面的气味,技术送来的正是江城烟火。这些作品动人的根源就在于文脉在先、技术在后。

由此看来,要让数智赋能不走向模板化,功夫还得下在地方文脉上。一是要把地方志、非遗技艺、民俗传说等文化资源系统地整理为地方文化数据集,让技术有根可依。二是要坚持人机协同,把重复劳动交给AI,把文化细节的挖掘与打磨留给本地文化工作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居民。三是要校准评价导向,少看生产数量和一时流量,多看内容辨识度、游客口碑和留量。

应当看到,数智工具越是普及,地方特色便越显珍贵。算法算得出流量,却算不出乡音里的亲切、烟火里的人情。守住文脉、留住烟火,才可以使数智赋能赋出特色、赋出温度。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传统戏剧类非遗戏剧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王珂莉

传统戏剧类非遗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审美精神与文化基因,其健康传承对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一些传统戏曲剧种面临受众老龄化、传承渠道狭窄、青年认同感不足等困境,单纯依靠技艺保存与师徒传授的传统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文化生态的发展需求。戏剧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传统戏剧类非遗走进校园、培育年轻受众、实现传承的重要渠道。推进戏剧教育创新,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更能让传统戏曲在当代教育场景中进一步焕发新生,实现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

构建分层课程体系,进一步夯实传承基础。课程体系是戏剧教育开展的重要依托,也是传统戏剧类非遗实现传承的重要保障。高校应以全年龄段覆盖为目标,建立分层、分类、分阶段的戏剧教育课程体系。基础教育阶段侧重文化普及与兴趣启蒙,通过戏曲赏析、脸谱绘画等教学活动,让学生直观感受戏曲之美,激发其主动学习的热情;中等教育阶段应强化体验与实践,开设戏曲基础表演、剧目排练等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高等教育阶段应深化专业研究,在开设戏曲史论、舞台编导、戏曲创作等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支持学生结合时代语境开展创新性改编与原创小戏创作。同时,结合地方剧种开发校本教材,将昆曲、京剧、越剧及各类地方剧

种纳入教学范畴,融入地域民俗、历史故事等丰富教学内容,打造本土化、特色化的课程,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

强化戏曲师资队伍,提升戏曲育人实效。教师作为戏剧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主体,其戏曲水平与教学能力影响着非遗传承的实际成效。一方面,要完善常态化的师资培养机制。学校应定期组织音乐教师、美术教师等参与传统戏剧类非遗专项培训,邀请戏曲传承人、院团资深演员等开设讲座,帮助在职教师提升戏剧专业能力与课堂教学水平。还可以鼓励教师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跟岗学习,深入剧目排演一线,参与舞台表演、演出统筹等相关工作,在实践中积累教学素材、提升专业素养。另一方面,要健全师资协作机制,打造一支由校内专业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协同育人的复合型教学队伍。高校应积极与地方戏曲院团、非遗保护中心合作,聘请当地戏曲院团演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担任兼职教师,负责授课、剧目创编指导等工作,带领学生学习唱腔、身段等技艺。

优化实践教学模式,激发戏曲传承活力。在校内,定期举办校园戏曲节、传统戏剧类非遗展演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戏曲传承氛围,鼓励学生将红色故事、时代主题等融入剧本创作与舞台设计,让学生在服装体验、走位排练中提升审美表现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增设角色扮演、剧目品读、情景演

绎等互动环节,让学生能够亲身感受唱念做打的艺术韵味,深入理解剧目背后的思想内涵与情感内核。在校外,学校可以与戏曲院团、非遗保护中心、地方文旅部门、文化场馆等达成深度合作,实现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互通共享,形成课堂教学、校园活动、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传承格局。比如,依托合作单位搭建实践学习平台,组织学生参观非遗传承工作室,现场观摩戏曲从业者的排演过程,并跟随专业演员学习基础身段与唱腔,参与剧目编排与演出,提高戏曲表演技能。

推动技术赋能教学,不断创新传承方式。一是搭建戏曲数字教学资源库,整合经典剧目、教学微课、传统戏曲纪录片等素材,构建丰富、多元的戏曲文化体系,便于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利用短视频、直播、动画等形式,打造系列年轻化戏曲短视频、开发线上云展览等,用轻量化、趣味化叙事贴近青年的审美习惯与媒介使用偏好,让传统戏曲艺术自然融入年轻群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二是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戏曲体验空间,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舞台表演的魅力,在互动体验中拉近与传统戏曲的距离。还可以开发化妆造体验、角色互动等功能,让学生自主体验脸谱绘制、戏服搭配,在沉浸式探索中深入了解戏曲服饰、脸谱背后蕴含的文化寓意,强化对戏曲艺术的感知与认同。同时,鼓励学生立足课

堂所学内容,运用各类新媒体工具创作戏曲短视频、国风动漫、微电影等数字作品,以接地气、趣味性的年轻化表达传播戏曲艺术,推动戏曲从传统舞台走向数字空间。

建立评价和激励机制,完善育人保障体系。在评价维度上,要改变以往以唱腔、身段等专业技能为主的单一评价方式,构建涵盖文化素养、实践能力、创新表现等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同时,引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教师等多元主体共同评分,既关注剧目创编、舞台表演等过程性表现,也重视成果性产出,综合评价学生的戏剧学习成效、价值认同程度与社会实践能力。在激励层面,需要建立健全激励制度,通过设立戏曲传承专项奖学金、举办优秀戏曲展演、评选非遗传承先进个人等方式,为获奖者提供适当的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同时,为优秀生提供外出研学、参与戏剧展演交流等实践机会,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觉参与到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工作中去。

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传承,既是文化使命,亦是时代课题。戏剧教育作为重要传承路径,需要不断创新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让古老戏曲更好地走进青年、融入当代。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化戏剧教育改革,让更多青少年成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学习者、实践者与传播者,推动中华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西安戏剧学院)

关学视域下清代陕西文人中西文化对话探析

李小慧

陕西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千年印记,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缘基因。这一地缘基因与陕西关学“学贵于用”的务实传统相互交融、相互滋养。清代陕西文人立足本土关学,在继承关学“学贵于用”“经世致民”务实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倾听不同文化,寻找不同文化对话的动态平衡。本文重新审视这段中西文化对话历程,梳理清代陕西文人参与中西文化对话的具体实践,提炼出以我为本、务实为则、双向交流的对话逻辑,探讨其对当代文化交流互鉴提供的独特的历史启示。

清代陕西文人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根基

(一)开放包容的治学精神。丝绸之路千年商道的贯通,使陕西天然具备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清代陕西文人如李颀、李柏、李因笃、刘光蕡等,均提倡“博学”“取众”,主张兼容各家不同的学派思想,讲求通过吸取各方知识来开阔学术视野。这一开放包容的治学心态,为清代陕西文人开启中西文化对话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土壤。

(二)理性务实的求实作风。自张载创立之初,关学便将“学贵于用”视为治学的重要指向。这一传统跨越宋、元、明三代,到清代仍延续不绝。李因笃认为研究经学的真正目的是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使学问最终落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而李颀的立场更为明确,他以“开物成务,康济群生”自任,反复申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认

为“体”是义理的根本,“用”是济世的实践,二者不可偏废。这种不尚空谈、不务虚名的务实作风,以是否切实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开辟出一条注重实效的实践路径。

(三)心怀天下的使命责任。清代陕西文人立足关学传统,具有心怀天下的使命责任。李颀一生主张“明学术,正人心”,试图通过昌明正学为乱世重建一套稳固的价值根基。晚清时的刘光蕡则试图从制度层面寻找到安定天下的方法。这种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为清代陕西文人的中西文化对话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清代陕西文人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核心特质

(一)以我为主。清代陕西文人处理中西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始终保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李颀主张“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认为“我”是“体”,“用”是实践,“明体”是“适用”的前提,为接纳西学预留了本土接口,这正是清代陕西文人在对待西学时“以我为主体”的精髓所在。后来,近现代学者吴宓将这一原则推向学科化实践,在他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中,“国粹”是“我”,“新知”是“他者”,只有“我”足够坚实,“对话”才有可能。

(二)以务实为原则。清代陕西文人处理中西文化的重要准则是“务实”,即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重要出发点,即是否对自己有益为取舍标准。刘光蕡主张西人之学皆归实用,应该讲求实学。他在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增设了

算学、天文等课程,刊印数学著作,筑观象台、置经纬仪供学生实测。务实原则使其面对中西文化激荡时,既不丧失主体性,也能积极吸纳有用之学。

(三)以双向对话为交流方式。清代陕西文人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不是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双向对话。刘光蕡在自己创办的崇实书院中设置了“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经史之学仍是书院的根基,但西方政治、法律、矿务、外语等新知识也进入了课堂。刘光蕡虽然接受了不少西学知识,但并不是要让西学替代中国传统经学,而是要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在这一理念下,他的一些门生弟子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刘光蕡的再传弟子吴宓学习了欧美分析文学的理论,但他又把这一方法用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撰写了《红楼梦新谈》《红楼梦之文学评价》等一系列论文。这一做法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走向世界,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

清代陕西文人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局限

(一)习惯以中国固有学问参照、比附西学。在一些清代陕西文人看来,西方自然科学并非西人所创,而是中学西传的结果,这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是在用“找回自家的东西”回避“学习他者的长处”。

(二)缺乏对西学的学理探究。清代陕西文人注重实用价值,但常常忽视了学理性的一面。崇实书院把物理、化学等归入“格致”之学,为制造器

物服务,具有明显的知识工具化倾向。刘光蕡与清末陕西政叶尔恺之间的争论,也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分歧。叶尔恺认为读西学当先读原书、弄懂内在义理,更倾向于进行学理层面的探究。在他看来,即使当下没有实验器具,也应该先把西学的道理弄清楚。刘光蕡则认为事物的实用价值更为重要。此外,李颀推荐《泰西水法》,也是因为该书对农业灌溉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些都说明清代陕西文人更为关心的是西学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器物、技术或治理方案,而不是西学背后的科学方法与理论体系,学理探究是居于第二位的。

结语

在面对西学时,清代陕西文人始终坚持自我、讲求务实,并且始终追求双向互动。这样的交流方式让深处内陆的陕西在当时接触到了不少来自世界的先进文化信息。但对与实用无关的学理有一定的忽视,也让这场文化对话留下了一定的历史遗憾。清代陕西文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效的文化对话不仅要立足自身,还要真诚地面对对方文化的内在逻辑,避免先入为主、简化外来知识。

[作者系榆林大学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2026YB0398)、2025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枢纽与对话:清代陕西文人著述中的区域文化交融研究”(25JK0278)的研究成果]

以系统思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李荣娟 夏诗微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近年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在不断实现覆盖城乡、结构合理、人人可及、平等享有的同时,部分地区在打造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等情况,致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有一定的错位,面临质量不佳、效益不高、功能不达标等问题,显示出一定的建设短板。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相关服务从广覆盖、保基本向高质量、高社会效益转变,由外延式“量”的增长转为内涵式“质”的提升,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也是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时代要求。

全面系统把握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与效益在内在关系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益是一个涵盖目标与手段、投入与产出、效率与效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需要改变一些地方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体现的“重投入轻产出、重效率轻效益”的观念,科学认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与效益的关系,形成“以质量求效益、以效益促质量”的良性循环。首先,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是效益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涵盖了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和融合发展,需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契合、与人民文化权益保障相适应、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相协调,推动文化资源的多元融合、深度转化和价值延伸,夯实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与经济效益的根基。其次,公共文化服务效益是质量的重要体现和改进的重要依据。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是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体现,应以此为依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从而形成“质量—效益—改进”的管理闭环。最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全链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落地

前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契合群众需求、反映时代精神、弘扬主流价值、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是发挥效益的重要基础。为进一步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需要各地加强顶层设计,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中心,把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置于首位,聚焦人民性、引领性、时代性和回应性等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属性,科学规划公共文化服务布局,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各地多元化优质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引导公共文化服务精品创作,形成“公共文化服务菜单”,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实现高质量供给与多元化需求的主动适配和无缝对接。

中端以社会效益为目标,优化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是整合供给主体。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资源共享、通力协作、良性互动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强化多方多级联动机制,进一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多层次供给。二是丰富供给形式。进一步打破文化与旅游、科技、商业、教育、生态等领域的边界,发挥公共文化的浸润和赋能效应,培育“文化+”跨界融合多样业态,扩展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场景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让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充分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三是创新供给方式。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承、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送文化”的基础上,搭建和完善覆盖城乡、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化平衡,实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集聚整合,通过需求识别、场景适配和沉浸式交互等途径,提供线上线下联动的一站式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同质化、标准化覆盖向个性化、精准化供给转变,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后端以质量效益为重要依据,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监督评估是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质效、激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环节。需要建立涵盖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关键变量、质效并重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主体,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流程,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健全全过程监督机制,在科学评估、全程监督、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中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全方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支撑体系

协同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益、确保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保障。一是夯实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基础。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职责,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健全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权责分配机制,成本与收益分担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统筹协调,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二是探索与公共文化服务质效相匹配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属性,以公共文化服务质效考核结果作为重要依据,通过补贴、金融服务、志愿服务等途径,探索“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形式,形成渠道多元、方式灵活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三是健全“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机制。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益目标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之下,建立“文化+”旅游、科技、商业、教育、生态的融合发展机制,延伸产业发展链条,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优化产业格局,健全市场体系,进一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李荣娟系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夏诗微系湖北大学湖北县域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